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

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1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ISBN 7 - 5013 - 1468 - 3

I. 联… I. 中… III. ①共产国际-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 ②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国际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史料 N. K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364 号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卷、第四卷
书名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
著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 北京市双桥威宁侯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40
字数 955(千字)
版次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 - 5013 - 1468 - 3/K·260
定价 精装 80.00 元(全二册)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王德京

学术指导

-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研
究员)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ИЙ СЕМИНАР
СВОБ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ЕРЛИНА

ВКП(б), КОМИНТЕРН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

ДОКУМЕНТЫ
Т. I . 1926—1927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КОЛЛЕГИЯ :
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М. ЛЕЙТНЕР (руководители работы),
К. М. АНДЕРСОН, В. И. ГЛУНИН, А. М. ГРИГОРЬЕВ,
Р. ФЕЛЬБЕР, К. В. ШЕВЕЛЁВ

МОСКВА, 1996

丛书前言

联共(布)^①、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①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下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二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268份,基本上都是首次发表,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谈及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会议记录;布勃诺夫使团关于华南形势和“三二〇事件”的报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罗易等人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和函电,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同胡汉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的谈话记录和往来书信等。这些文件记录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冯玉祥在北方的失败、北伐的开始、“三二〇事件”、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国共关系破裂等的态度,反映了它们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演变过程,同时也暴露了它们试图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变成工农革命、使国民党变成工农党,并要在国民党各派保持联

盟情况下开展土地革命等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现实性。这些文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绍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6年上半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1997年初着手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两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四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第三部分从略。另外，根据中国读者的要求，我们还补译第一卷译本略去的人名索引，与本卷译本人名索引合编在一起。为反映文件原貌，本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作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广东语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注明其姓名全称。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

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刘桂生教授、张注洪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宏江（中央编译局译审）、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前 言

奉献给读者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系列文件集的第二卷，将续完第一卷^①对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第一个很长时期（1922—1927）对华政策的阐述，这个时期从战略策略方针的内容来看是统一的。这个时期的对华政策是以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各种力量，而首先同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方式实行的。

收入第二卷的文件涵盖了从1926年初到1927年7月中旬，即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同武汉国民党之间关系破裂的这一时期。

正是在这个时期，于1924至1925年间在苏联的积极支持下制订的并开始实施的军政计划，在国民革命军所进行的北伐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内部演变过程仍在继续并有了新的发展。群众运动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地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对于保证国民革命军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在许多方面，首先是由于共产党

^① 即《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件集，莫斯科1994年版。

人的积极工作，国民党大大扩大了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也有很大发展。但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向长江进发和向华中华东一些大城市推进，以前在双方关系中就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又尖锐起来了。1927年春，当可以清楚地看出消灭主要地方军阀集团和统一中国基本领土已不是遥远未来的问题时，这些矛盾和冲突就特别地尖锐，因为需要解决由哪一种力量组合来决定未来国民党国家体制的性质问题。

第二卷的文件补充说明了这些冲突中的主要事件，即1926年的“三二〇事件”、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组织联席代表会议在广州的召开、1926年底1927年初对国民政府所在地的争论、在占领南京和上海前夕和期间展开的控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革命军的斗争（这场斗争最后以国民革命运动的分裂而告终），最后是同武汉政府发生的冲突（这次冲突是由于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试图将武汉国民党变成“革命的雅各宾”党并在其支持下发动土地革命而引起的）。

像在第一卷中一样，编者注意的中心首先是揭示文件集主题的文件，也就是揭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各种力量的政策及其理论和策略方针的文件，以及揭示对实现所提出的目标的途径的探索和苏联驻华代表的立场等等的文件。

正是考虑到这个主题，第二卷的材料分成几个与莫斯科的策略方针的探索和变换时期相对应的基本部分。

同时应当考虑到，这种策略方针的变换或侧重点在一些场合是与中国的实际事态发展有关（如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在北方的失败、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的叛变），在另一些场合则明显提出的为时过晚（如“三二〇事件”、北伐开始），或相反反映了往往脱离实际的主观意向（如与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方针有关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

各部分的引言指出了本卷文件为阐明主题，即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同国共两党关系中的重大事件、部分决议的制订内情，以及苏联领导在这个时期的总的对华政策的内容及其演变提供了哪些新东西。本卷文件表明，中国的事态发展，国民革命阵营中的力量对比，越来越显示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现实性。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试图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变成工农革命，使国民党变成工农党，并在同国民党某些派别保持联盟的情况下开展土地革命。

莫斯科认为这个方针的破产就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实际上这个时期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克服中国的半殖民地附属地位和政治上的分崩离析状态方面迈出了明显的一步，是使中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变成有活动能力和有组织的力量的一个重要阶段。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实行合作才成为国内执政力量的。

1927年7月同国民党关系的破裂，意味着一个完整历史阶段的结束，并揭开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

策和国共两党历史的一个新的时期。

莫斯科宣布，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都是没有能力解决国民革命运动任务的“反革命力量”，它把“继续争取通过‘平民’途径，也就是通过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城市贫民联盟的革命进攻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①的任务放到了中国共产党一党身上，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转入同所有与它相对立的力量公开对抗。

不久，这些表明莫斯科对华政策进一步“向左”转的新的估计和指导方针，变成了在中国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方针，联共（布）、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试图把这个方针实行到30年代中期。

本系列文件集后面几卷将专门阐述莫斯科在这个新的时期的对华政策。

*

*

*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自1920年初至1927年夏的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及其目标和实施方法，以及本卷的档案资料来源和对这个时期存在的历史“空白点”的说明（至今还没有找到所需要的文件来阐明这些空白点）——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重要方面在第一卷的绪论中都作了分析和说明，编者认为这个绪论乃是第一、二卷的总绪论。

这里不再重复这个绪论的基本论点，在第二卷的这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1927年7月13日），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86年版第141页。

个简短的前言中，只向读者说明选择本卷文件的原则。

同第一卷一样，本卷也是收录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档案文件。但也有例外，如不久前发现和发表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一些信件^①。这些信件披露了许多业已公布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决议的内情。发掘文件数量之多和这些文件的意义促使编者分两册出版第二卷，并编有统一页码。本卷容量很大，所以编者决定不仅收录一些很重要的但已发表过的材料（例如斯大林、布哈林^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和讲话）^③，而且还收录以前没有发表过的、很有意思的、但数量很大的中国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七、八次全会专门委员会的材料，以及联共（布）中央全会和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青年共产国际和农民国际的一些部和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材料。

除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管的主要一组材料外，第二卷还收录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的几个文件。这些文件是根据我们的查询找到的，并由该馆工作人员盛情提供给编者的。

遗憾的是，不得不加以说明，有许多文件编者至今还没有找到（例如鲍罗廷和加伦给莫斯科的电报和报告），还有一些在已发表的材料中以某种方式提到的发给莫斯科的和莫斯科发出的函电也没有找到。

①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莫斯科1995年版。

② 《中国革命问题》，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

③ 《托洛茨基档案，苏联的共产主义反对派（1923—1927）》，Ю. 费尔什廷斯基编，莫斯科1990年版第一、二卷；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纽约1932年版；《托洛茨基论中国》，纽约1976年版。

编者不能不重提总绪论结尾部分谈到的希望和信念：随着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其他档案馆藏的开放，在论述这个题目的文献出版物和史学家著作中，“文件没有找到”的注释会越来越少。

*

*

*

本卷是根据《苏联历史文献出版规定》（莫斯科1990年）编辑出版的。有一些文件不是全文发表，删去了与本文件集题目无关的部分，以及意思不清、空白或无法辨认的片断。文件复制时使用了现代拼写法和标点符号。中文专有名称用现代拼音，未被确证为同一名称者除外。文件集中保留了广州、香港等城市的传统名称，以及20年代在文献和通信中惯用的缩写，如中国政府、国民政府、民族革命运动等。保留了制订文件时期所特有的并已纳入辞典的一些缩写，如党支部、党的工作、宣传工作、党的组成、革委会、政治部等。

参加本文件集编辑工作的有：俄方的历史学博士、教授 K. M. 安德逊，历史学博士、教授 B. И. 格卢宁，历史学博士、教授 A. M. 格里戈里耶夫，哲学博士、教授 M. И. 季塔连科，历史学副博士、副教授 K. B. 舍维廖夫，B. H. 谢契林娜；德方的教授郭恒钰、M. 莱特奈尔和 P. 费尔帕。

编者认为自己有责任特别指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郭恒钰教授为策划本合作方案作出的贡献。

编者衷心感谢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的